

梁运昌和《杜园说杜》

张 忠 纲

一

梁运昌，初名雷，字慎中，一字曼云，又字叔曼（梁章钜《曼云先兄家传》云“曼叔”，后人多从之，但运昌自署“叔曼”），成进士后改名运昌，晚号江田田父。福建长乐人。生于清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，卒于道光七年（1827），享年五十七岁。为梁章钜堂兄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秋七月随叔父上泰入都，年底随叔父入黔，次年三月抵贵阳。五十九年（1794）四月还乡应秋试，与兄际昌、从弟章钜同中乡举。嘉庆四年（1799）成进士，入翰林，是年秋开实录馆，座主朱珪领其事，择儒臣二十八人奏为纂修，运昌以新庶常获与兹选。散馆授编修。后归里，旋丁内忧，又因体弱多病，遂不复出。生平落落寡合，尤不喜与显贵者往来。在京师时，惟与同年王引之、卢坤、张澍、吴麐枚等为道义文字之交。归里后，亦断绝音问。数人中有持节来闽者，则亦彼此不通一刺，足迹不入州府，有过访者辄拒不纳。闭门读书，谢绝人事，于医卜堪舆之学，无不深究，精篆刻，善书法，通绘事，晓音乐。著作甚丰，有《秋竹斋诗存》、《秋竹斋别集》、《劳薪集》、《葵外山房牋稿》、《陈氏古音考订》、《读诗考韵新谱》、《四书偶识》、《史汉眉评》、《说文小笺》、《难经发明》、《两汉魏晋宋齐诗式》、《全唐诗随笔》、

《唐诗风格集》、《阳春白雪集》、《韩诗细》、《苏诗抄》等。乡人谢章铤称其“见解议论，皆能自出手眼，羌非随声附和者比。”（《课余续录》卷三）

梁氏尤酷嗜杜诗，枕藉其中数十年，穷一生精力而成《杜园说杜》一书，惜未刊行。陈衍《石遗室书录》云：“注杜诗者号称千家，谬误者不少。是书其晚年所纂，为秋竹斋本，道光五年告成，观其《叙例》，自言为一生最得意之作，经三易稿，手自抄写，行楷极工整，卷一至卷七为五古，卷八卷九为七古，卷十至卷十四为五律，卷十五至卷十六为七律，卷十七至卷十九为五排，卷二十为绝句。运昌遗书多在其婿何广熹处，何氏藏书久已散失，此书今藏陈弢庵太傅处，缺第十四卷。又附录尚有四卷，曰杜谭上、杜谭下，曰批摘赅诗、附未录诗，曰年表、叙例、目录、题辞，今皆不传。又秋竹斋尚有《杜园臆说》，全帙亦自录者，亦未见。”（转引自《民国福建通志·艺文志》）陈衍所见稿本为二十卷，未见附录四卷，《民国福建通志·文苑传》亦云二十卷。而《艺文杂志》1936年一卷二、三期转载此书卷一时，其玄孙梁鸿志记云：“《杜园说杜》二十四卷，先曾伯祖曼云公遗著也。……此书旧为陈大弥孝廉所藏，大弥以之质钱陈弢庵先生家，先生子几士持以遗予者也。全稿首尾二十余万言，皆公手书而自加点勘者，故无一字讹误。老辈著书之苦，用力之勤，可为师法。至于讲解详明，考证精确，有迥非钱牧斋、仇沧柱所能及者，公自谓老杜功臣，殆非夸语矣。”因几经易稿，故各本文字略有异同，卷次划分亦有变动。《艺文杂志》载《杜园说杜·凡例》叙成书过程云：“是编始从事于己卯（嘉庆二十四年，1819年）夏月，至庚辰（1820）春暮而脱稿。是岁端午，稿凡再易，孤愤盈怀，长年不寐，寒窗漏尽，炉火无温，挑灯作急就章，不觉曙光之射入，斯时殆弗能自罢，虽病体亦忘其劬，一阁笔而呻吟之声作矣。穷愁著书，余姑援此例以自慰焉。编仍分体之旧，

庐为五言古诗七卷，七言歌行二卷，五言近体五卷，七言近体二卷，五言排律三卷，七言附焉，五七言绝句共一卷，杜谭百一二卷，叙例、题辞、目录共一卷，附批摘贗诗一卷。总共二十四卷，合录各体诗共一千二百八十首，其未录者，并剔去贗作，尚一百一十三首。义无当于毛公之弟子，意自许为杜氏之功臣，未敢质诸宗工，姑可藏之家塾。嗟夫！沙头病鹤，志屈而悲哀频。床下寒蛩，音微而感激异。昔之字欹墨淡，作诗半出于呻吟；今兹目暗灯昏，属思多由于渴睡。孤寂之况，有同情矣。目苦之劳，谁其闵之？嗟夫！家余敝帚，聊将自享以千金。曩有焦桐，直待赏音于百载。良朋不作，搜帐籍者谁人？子弟非佳，贮楹书于何处？不亦悲哉！嘉庆二十有五年岁次庚辰端阳叔曼父书于秋竹山斋，道光五年乙酉岁六月重录五古、五七律十三卷，颇有更定。是岁中秋续录七古、绝句皆毕，惟排律未录，望日记。重阳前一日录排律竟，于是二十四卷皆备。”是本当为最后定稿本。今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稿本则早于上本。影印稿本扉页梁氏自记云：“不阅此卷已二年，今日取视，凡所解说，自诧其可以必传，但家无藏籍，未稔诸家说有与吾说相同否也？……道光五年五月十一日。”是影印稿本之后，梁氏于六月至九月又重录一过，“颇有更定”，“于是二十四卷皆备。”由此可见，影印稿本实则为未定稿。该本首列“纪读杜诗始末”，自叙乾隆五十七年秋七月，随叔父入都，路经杭州吴山，购得杜诗一帙，“舟车之隙，时一流览”。次年三月，随叔父抵达贵阳，“凡晨夕所晤对，皆浣花一老也”，后患疟疾，病中亦读杜不辍。乾隆五十九年还乡应秋试，中乡举，“自是每有行，必挟以自随，即家居之日，岁亦覆阅一再过，有所得则以数语志之。积二十余年，眉间填写殆满。嘉庆己卯冬，乃葺而录之，哀然成卷帙。庚辰春，重加芟补，中秋既尽，再易稿而成书”。次列“杜园答问”，自称杜园主人，闭门读杜，不交当世，不通庆吊，虽亲戚不得见其

面，惟以杜诗自娱。次列“凡例”十则。次录《题杜工部诗集后十二绝句》，此组诗作于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正月，自述治杜的体会，有的认识颇为深刻，如“寻常染翰欲无聊，尚觉高岑去未遥。忧国忧民初郁结，斑斑血泪洒鲛绡。”“储王五字擅风流，此老清词竟不侔。史骨骚情庄气脉，雄文何事费雕镂。”后则分卷解说杜诗。卷末附“七律补遗八首”、“伪诗辨说”若干首、“杜谭百一”101条。该稿本“凡例”所说有与各卷内容不尽相符者，如“凡例”云五古六卷、七古二卷、五律六卷、七律二卷、五排三卷七排附焉、五七绝共一卷、“杜谭百一”二卷、序例目录一卷，而实则五律只有四卷，七律只有一卷，“杜谭百一”不分卷。“凡例”云：“总共二十卷，凡录各体诗共一千三百首。”实收诗1361首，其中五古269首，七古114首，五律622首，七律133首，五排118首，七排5首，五七绝100首。关于书名，各卷标法亦不一致，如卷一标“杜园末议”，卷五、卷十二下标“杜园琐议”，卷十标“杜诗脞录”，余则标“杜园说杜”。据此可知，“杜园说杜”乃其最后之定名。

二

《杜园说杜》乃梁运昌竭一生之精力而为之，故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陈衍《石遗室书录》云：“此书考订事实，实有见前所未见者，纠正浦氏、仇氏、钱氏各家谬误处甚多，如谓少陵实卒于岳州，不卒于耒阳；陷贼时，实藏匿赞公大云寺；严武在蜀无欲杀杜老事。此类甚多，皆精确可据，论诗亦多特识，读杜者不可不读之书也。”《民国福建通志·文苑传》亦云：“《杜园读杜》二十卷，合史学、诗学而会通之，多发明，自来评杜注杜者所未及，可谓一生精力尽于此书矣。”叶恭绰《〈读杜札记〉序》云：“闽中诗家辈出，夙以祧唐学杜相揭橥。清嘉、道间，长乐梁曼云运昌，著有《杜园说杜》廿四卷，考订史实，疏解句

义，粲然大备。”郭曾炘《读杜札记》一书，多采梁说，给予很高的评价。

梁氏说杜，主张“读杜诗，但涵咏句义，理会真切，诗指既明，史事自来凑合。从前注家，每指定一事，而屈揉杜诗以强合之，故往往穿凿附会。兹编一举而空之，而诗义亦未尝不明。惟于本人事实，间标一二语，要必切实不误，无敢作影响语。”

（《凡例》）因此，他不象仇兆鳌那样，斤斤于无一字无来历，详注出处，摭拾典故，有失琐碎；亦不象钱谦益那样，搜抉史实，以史解诗，有时误解“诗史”之义，所以他批评“钱氏《杜诗笺》援引史实，最为穿凿。”而是着重于杜诗的总体把握，提阐宗旨，领会诗意，言简意赅，不作揣影听声、描头画角的繁琐考证与冗长解释。如他说：“‘每饭不忘君国’一语，是全部杜诗大纲领。余更有一语曰：‘一生忧在黎元’，恰好作一对。其所流露处皆本于性真，不是空张门面语，故自许稷离而人皆信之。”又说：“通观全集，则‘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’二语，为通集提纲；《同元道州春陵行》一诗，为中间关键；《咏怀》次首（实为第一首）‘日给在军储，上官督有司。高贤迫形势，不暇相扶持。疲茶苟怀策，栖屑无所施’数语，为全诗眼目；最后《客游》

（应为《客从》）诗云：‘客从南溟来，遗我泉客珠。珠中有隐字，欲辨不成书。缄之篋笥久，以俟公家须。开视化为血，哀今征敛无’。此诗为全集结束。盖公有一片痛哭流涕为民请命之诚，期于还朝自陈之丹陛，今则望绝班行，徒存满腔热血，至此而稷离之心死矣。其余左萦右拂，无非此等语言，盖何尝一日忘斯民哉！《同元道州》二诗，不能达之奏议，而思托之采风以告当事，其用心良苦。使得一日立朝，必将恺切敷陈，又早以直言出矣，岂能安此身于庙堂之上，吁可慨也夫！”（《杜谭百一》）梁氏此论，可谓剔抉杜诗精髓。正因如此，他不把杜甫仅看作一个单纯的诗人，而认为他具有雄才大略，远见卓识，所以他尖锐

地批评新、旧《唐书》对杜甫生平行事的错误记述与评价。他说：“《旧唐书》疏略误谬，其于杜老事实，十不得一，而妄下‘褊躁傲诞’评语，先入之言，误天下后世多矣。《新唐书》又诋之曰：‘好论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’，此何所指耶？试以《有感》五诗论之：第一首言吐蕃扰边，由于抚驭失策；第二首言河北未靖，不宜勤兵外夷，贾山至言，如此而已；第三首论迁都洛阳，与郭汾阳议合；第四首论分建宗藩，与房次律议合；第五首论牧守权轻，与乌重胤说合。如此论事，可谓高而不切耶！其余议论明决处，难以悉数。宋景文肆口诋议，恶睹厥指。”又进一步阐述说：“‘焉得一万人，疾驱塞芦子’，扼要之图也；‘莫守邺城下，轩鲸辽海波’，捣巢之计也；‘花门既须留，原野转萧瑟’，主客之形也；‘焉得附书与我军，忍待明年莫仓卒’，迟速之机也；‘苟能制侵陵，岂在多杀伤’，固圉之术也；‘官军请深入，蓄锐可俱发’，用长之算也；‘八州壮士思一战，三城守边却可图’，击虚之策也；至‘借问悬军（当为“车”）守，何如俭德临’，则探本之论矣。杜老筹兵之略，其见于诗句者已可窥见一斑。他如‘自从收帝里，谁复总戎机’，论不用郭汾阳主兵而用仆固怀恩之谬；‘仰思调玉烛，谁定握青萍’，论九节度事权相等，无所统率，预料其不能成功；‘总戎存大体，降将饰卑词’，论河北奏留降将之失策；‘青海今谁得，西戎实饱飞’，论公主下降吐蕃、割地饵戎之非计。其论吐蕃也，为朝廷则言和，为蜀边则言战，失地而议和为损国威，既胜而予和，为裨国计；以至严武既去，知蜀中之必乱；崔瓘未败，料湖南之不安。皆瞭然于事势之微而灼然于先机之见，可谓‘高论不切’耶？使宋景文见余此说，不知作何道”？（同上）陆游《读杜诗》云：“看渠胸次隘宇宙，惜哉千万不一施。空回英概入笔墨，生民清庙非唐诗。向今天开太宗业，马周遇合非公谁。后世但作诗人看，使我抚几空嗟咨。”梁氏与放翁可谓是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的。梁氏紧扣杜甫所处时代

及其独特的遭遇和艺术个性，兼与其同时诸家比较，深刻论述杜诗的独特之处。他说：“五律初诣，去高岑王李不远，中年以后，加以沉郁瑰博，遂与诸家复绝。而又遭逢世故，其一种系心君国，叹世忧民，悲哀拂郁之作，出于血性，结为泪痕，岂寻常诗人所可同日道耶！白香山云：‘不得高官职，仍逢苦乱离。’又云：‘天意君须会，人间要好诗’。似乎渔阳一番鼙鼓，祇以成就浣花一老者。然同时诗人多矣，独此老为天意所属，则亦其忠孝之天姿，异乎人耳。若其寻常降一格之作，固与高岑相伯仲也。古诗上者，树骨于左史，取材于骚雅，而就范于建安、正始。其降一格者，大略以瘦峭为宗，不肯一字落齐梁度内。”（同上）

在论析具体诗篇时，梁氏亦能注意与诸家比较，抉出杜诗独到处，而不作泛泛论列。如卷一说《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》诗：

“将同时高适、岑参二诗参看，乃知公诗命意之高，语语是说时事，而语语只是说登临。妙在起四句从后文忧危意倒转而出，已见机隍之象。如此笔意，岂元白辈所有？”卷七说《高都护骢马行》：“少陵最喜作鹰诗、马诗，鹰以寄其搏击之思，马以寓其驰驱之志，然马诗每首各出一意，未尝通套。此篇从安西立功之马新到长安上立意。首二句点明都护骢马，清出眉目。次二句急补出安西立功，以为一诗之根。‘功成’四句说从安西至长安。‘雄姿’一联顿挫最有筋节，最有笔力。‘腕促’四句，说其来路所经，而带表其材力骨格，他人不能如此简括。末四句从长安回环到安西，与篇首相应：前二应起二句，后二应次二句，‘青丝’二语为马设想，即伏波马革裹尸意。此意不可少，无此一层，则到长安后遂成废物矣。此杜老早年体格，去高岑王李不远，特其苍劲雄浑之气，本自性生，故出笔便自高卓尔。此种若加以姿致风华，而放缓其音调，即是四家体也。”梁氏对杜诗涵咏咀嚼，烂熟于胸，其论杜既能恰切地征引史实以阐发诗意，又能互相比勘，于一字一句中发现深含的意蕴，故能阐幽显微，发前人所未

发，独出新意，多所创获。如卷五说《八哀诗》云：八公并有可哀处，皆不能忘情者，故类聚为诗，犹《五君咏》之例也。伤时盗贼，兴起王、李而不及汾阳者，汾阳以功名终，无可哀处，正犹山涛、王戎之贵显耳。次律于伤时、叹旧、怀贤三项，皆切而不及之者，避嫌疑也。不及太白者，前受不世之知，后虽被谴，旋经赦宥，其冤已白，不比广文之情事可哀也。严武介在伤时、叹旧之间，故次于王、李，而在汝阳前。汝阳及李、苏、郑三公皆为叹旧，惟张相国无旧，独为怀贤。相国一身系兴衰理乱之枢机，以之终篇，则仍是伤时之旨。（此据《读杜札记》撮述大意，与今稿本文字有异而意义较胜，想为定稿本文字，下同）此说较王嗣奭《杜臆》尤为详悉。又进而说《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琚》章云：肃宗惩永王璘之事，疏忌兄弟，自是诸王无出阁者。仅有两子，而建宁以谗赐死，广平亦几于动摇。房琯一建分藩之议，即致斥逐，不论其为长王赐辅也。汉中王瑒持括马不可之议，即贬蓬州，明是借此斥外之耳。代宗自建宁外，别无亲兄弟，德宗只有一子，乃欲废之而立姪，非邝侯力谏，其事竟行矣。三朝之间，父子莫能相保，何况兄弟宗族？高祖、太宗之子孙夷于庶姓，睿宗之子申、岐、薛之后寂然无闻，而让皇二子，其一已卒，其一远窜，斯时凄凉冷落之况，不言可知。杜老即欲为汝阳叙哀，而一开口便碍着肃宗，最难措语。故但将先朝恩遇与王之所以承恩眷者，并其文雅交游，写到十分热闹。及其身后只淡淡著“墓久狐兔邻”五字，旋即插入汉中远谪，则肃宗既不为汝阳立后，只有同怀一弟，又不令守其坟墓，以致夷为狐兔窟穴。读者至此，不待雍门之弹，早已涕泗流离矣。剖析可谓精细入微，所以郭曾炘极力称赞“杜园此论，推见至隐，颇具论世特识。如此解，则哀字乃有着落。卢德水谓汝阳被宠善终，本无可哀，直以下交情厚伤旧而赋，盖未见及此。”（《读杜札记》，以下凡引郭说皆见此书，不另注明）又如卷十二说《秋兴八首》云：自

来说此诗者于第二、三章并未有得正解者，皆坐未知“奉使”句义，今先为证明之。按《送从弟亚》云“所以子奉使”，《赠萧十二使君》云“俱为蜀使臣”。凡带京职为幕僚者，皆称使臣。杜诗言奉使者一二十处，以此意读之，无不合者。此诗首章为秋兴缘起，次章因入幕而留滞难归，三章又推原说，因抗疏而沦落不振。所以然者，皆因乱离以后，朝班换局，文武易人，曩日旧臣自然退废，况又西北两路兵戈未息，道路不通，远地羁栖，能无冷寂？故以第四章总叙时局。以后四章则以“有所思”一语领出，致其今昔盛衰之感，所思往事，皆指开元盛时。“昔曾”字，“武帝”字，隐然有一明皇在。观四章所述，皆献赋授官以前，而不及拾遗谏垣以后，亦可见所思在平居未乱以前矣。末章“昔”字总收上四章，与第四首“昔时”呼应。故郭曾炘说：“其以幕职为奉使，则杜园之创解。然引证诸条，均确有据。得此解而此句乃昭然发矇。其说第二、三、四章，亦颇得杜陵心事。”他如说《羌村三首》：“不能喜亦不能悲，先写出‘怪’字，则前此绝望之久可知。合家痛哭之状，又从邻人写出。欢喜之极，又从相对无言写出，真传神之笔。”（卷二）体会入微，论诗可谓细矣！

梁氏论杜诗用字用韵，亦颇多精到之处。如说杜诗复押之韵，除《饮中八仙歌》外，“皆文同义异”。说《今夕行》，借换调为换笔，故于篇末用转韵作法。说《天育骠骑歌》，前四句一转韵，后则二句一转韵，音节愈收愈紧。说《哀王孙》，诗分四段，一韵到底，而于每段首加押一韵，此亦少陵创格。说《短歌行赠王郎司直》，每四句后用一单句间之，单句只一语，实是一段文字，篇法调法，并为奇绝。说《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》，“芮公”四句，中间过渡，故两句蒙上用韵，两句连下用韵；《久雨期王将军不至》中间一段，亦二韵蒙上，二韵连下；《送重表姪王砮评事使南海》“凤雏”二句连下韵，而无蒙

上处；《桃竹杖引》用沃两韵、职两韵，而于职韵之两出句，蒙上沃字韵，亦老杜新格；《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》立字韵，韵则连上，语则连下。又列举众多例证，指出“杜诗用韵通转处，最为有意”，如质、勿、月、曷、黠、屑六部为一类，即平韵真、文、元、寒、删、先之入声也。六部由质而勿而月以至于屑，至屑则又入质，递通递转，如环无端，凡用通韵，必有主部，主部多于起一、二联见之，末韵仍收到此部，尤为周密。中间通转，亦有次序，如以曷、黠为主部，则与质声稍远，须上转勿而下转屑，而后可以入质；若以质为主部，则屑其上转者，下转必先入勿，而后可以入曷、黠。盖六部虽为一类，其中自分为四限：质为一限，勿、月为一限，曷、黠为一限，屑为一限。用韵必依此序，斯不相隔越矣。然质声终远于五部，杜诗用此六部者，必少用质声，间于篇末一用，绝无一字与月、曷、黠相搀杂者，其或用至数字，则必汇置一处。又说杜诗律句多有五仄对四平者，如“乱后碧井废，时清瑶殿深”、“草木岁月晚，关河霜雪清”、“志士惜妄动，知深难固辞”、“客里有所适，归来知路难”、“小雨夜复密，回风吹早秋”之类是也。然拗句必在发端，即五六句，亦后解之发端也。苏轼“慧水雨已涨，廉泉春乍流”，犹用此格，而置于三四句，未尽合古法。杜诗“力疾坐清晓，来诗悲早春”、“日日避群盗，悠悠经十年”，则上句第四字间可用平；“致此自僻远，又非珠玉装”，则下句首字间可用仄。亦有四仄三平者，“微雨不滑道，断云疏复行”、“奔峭背赤甲，断崖当白盐。”是也。上句大概第三字宜仄，然“肃肃花絮晚，霏霏红素轻”、“日落风亦起，城头乌尾讹”，未尝不可用也。更有上句只用两仄而下句四平者，“岷岭南蛮北，徐关东海西”、“垂老戎衣窄，归休寒色深”，此皆变调，不拘一格也。此类尚多，胪举略尽，条分缕析，锱铢必较，可谓精细。

三

梁氏说杜虽不乏新见，但终因“家无藏籍”，未能遍览诸家之说，故于论杜，或自诩新见，实为因袭前人之说；或牵强附会，求之过深；或错会诗意，曲解杜诗；或考证欠慎，致成谬误。如卷五说《昔游》（“昔者与高李”首）诗云：“后段所言，颇与房琯相合。曰‘商山’，曰‘蜀主’，琯乃上皇遣辅少主，于四皓、孔明为切。‘议得失’者，谓始参帷幄；‘脱嫌疑’者，对终相疑贰。吕尚以将言，傅说以相言，并贴切琯事。若作公自寓看，便嫌廓落，他人又无足以当之，则指琯无疑也。”梁氏颇为沾沾自喜，自诩“此篇亦是特解，从来无人道者，此说虽创，然实有理，不比穿凿。”实则钱谦益早已指出：“吕尚，似指房公罢相后册封清河郡公也。言国邑虽封，而相业则已矣。”（《钱注杜诗》卷七）梁氏批评钱氏笺杜诗“援引史实，最为穿凿”，自己却时蹈钱氏覆辙，未免过求之失。如卷十三说《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》，由于误解《壮游》诗“忤下考功第，独辞京兆堂”二句，认为“所忤者即是仲通”，又想当然地认为“触忤非有他故，意仲通有意收罗，公鄙其依附权门，弗肯投谒，故为其所下。”而史实是杜甫“忤下考功第”在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，而鲜于仲通为京兆尹则在天宝十一载（752），实风马牛不相及也。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故梁氏说此诗处处曲解诗意。杜甫献诗仲通明明望其荐达，所谓“早晚报平津”也，而梁氏却武断地认为“此番献赋，非必求其荐达，聊以解前日之衅，使不与己为难耳。”并批评他人“妄解以‘凤雏’指仲通之子，又以此诗为召试后作。召试时林甫方赫奕，岂敢向其私人直加指斥，且又何以谓之‘前政’耶？甚哉其谬也。”殊不知，天宝十一载十一月，李林甫已卒，且仲通非林甫“私人”，乃杨国忠亲信耳，时国忠为右相，荐仲通为京兆尹，“报平津”，即指国忠。梁氏说此诗

“固不望其出力，但使其不能为恶足矣。文字妙用如此，非杜老妙笔，孰能为之。”其实，杜甫对仲通实无贬意，而多赞扬，献诗如此，即使在仲通死后，亦复如此。大历二年在夔州，杜甫赠仲通第三子鲜于灵诗《送鲜于万州迁巴州》开头即云：“京兆先时杰，琳琅照一门。”仲通有子六人，皆有令问，“凤雏”即指仲通诸子，何“妄解”云尔！又杜甫《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》，对哥舒翰极尽赞美之能事，诗末“未为珠履客，已见白头翁。壮节初题柱，生涯独转蓬。几年春草歇，今日暮途穷。军事留孙楚，行间识吕蒙。防身一长剑，将欲倚崆峒”云云，明明是冀翰荐拔，欲参翰幕，梁氏却曲为解说：“《赠高三十五》云：‘请君问主将，安用穷荒为？’七绝口号云：‘朝廷忽用哥舒将，杀伐虚悲公主亲。’是公意不以翰为然，若入其幕，将自背其言耶！旧说皆谓望开府引拔，按诗意只是诉以途穷，希其赍恤，‘倚长剑’，明只说倚赖，未说入幕，如韩昌黎上于襄阳书之意，乃唐人常径。”（卷十三）梁氏之所以曲解杜诗，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他主观地空悬了一个高标准，认为杜甫是稷卨一流人物，是“一时奇士”、“一时畸人”，是一个“完人”，十全十美，毫无瑕疵，因此他对杜甫干谒投赠一类诗作曲为讳饰，致成谬误。他如释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“今欲东入海”云：“入海，谓东游也。《赠张太常》篇云：‘适越空颠蹶’，即谓此行也。”（卷一）误为杜甫早年的吴越之游。释《解闷十二首》“商胡离别下扬州”云：“商胡，地名，在恩冀上流。”（卷十六）将胡商误为地名。此类小疵尚多，兹不赘举。

影印稿本《杜园说杜》，因不是最后定稿，故有不少草率之处，特别是卷十二上“五律次录”165首，有的诗题抹去，眉批“不录”，有的只抄题目，未抄全文，眉批“此首不录”，有的眉批“此首宜入正录”，有的只录正文，无注无解。因是“次录”，作者漫不经心，故错谬疏漏甚多。如《晚晴吴郎见过北

舍》诗，除首句外，余皆为《白露》诗句；《寄杜位》诗，除首句“寒日经檐短”外，余皆为《卜居》诗句；《宴胡侍御书堂》，则全错抄《舟中》诗，且错漏数字。另梁氏特撰《伪诗辨说》一卷，共十二首，绝句不计，加上正集中梁氏自定的伪诗，共有三十余首，如《可叹》、《泛江送客》、《雨晴》、《送何侍御归朝》、《江亭送眉州辛别驾》、《台上得凉字》、《宴胡侍御书堂》、《冬深》、《至日遣兴》、《赤甲》、《柏学士茅屋》、《双燕》、《寄峡州刘伯华使君四十韵》、《进艇》、《至后》、《人日》、《杜鹃行》、《哭长孙侍御》、《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》、《虢国夫人》、《去蜀》等，有的前人已指出，有的系梁氏自见，有的有一定根据，但多数证据不足，缺乏版本依据。有的纯系以意为之，终嫌轻率。总之，梁氏之见，聊备一说而已。

《杜园说杜》虽有上述不足之处，但瑕不掩瑜。此书诚如陈衍所说：“读杜者不可不读之书也。”今书目文献出版社将该书影印出版，诚学术界一大美事，故不揣浅陋，竭诚推荐给从事杜诗研究的同志们和朋友们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